

理想信念的力量

——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述论

杨军红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摘 要:抗战初期,来自国统区、沦陷区及抗日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高度信任和向往,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信念,赴延安投奔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实现民族解放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青年知识分子;延安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4-0024-04

一个人理想信念的塑造与形成受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学校教育及后天经验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并固化于人的内心世界,就必然对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及人生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抗战初期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条件,选择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延安,出现了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或对共产党领导抗战持有坚定信念。

一、国统区青年为信念去延安

身处国民党统治区域(以下简称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受到抗战前方那样的生命威胁,国统区拥有的各种资源也远比延安丰富,但是不少人明知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毅然放弃了国统区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千里迢迢赴延安投奔共产党。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共产党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是难以作出这样的取舍的。

当年去延安的河南青年、建国后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马勤对此深有体会。他谈到当时很多青年从国统区去延安,是因为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延安是抗战的旗帜。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损人失地给他们留下抗战无能的印象,而对国民党逐渐失去了信心。正是这种对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信心,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失望,激励着他们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他说:“当时国民党靠不住,大家的印象就是国民党不抵抗。当时我们有些教师讲,国民党这个搞法,中国不亡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认为延安就是抗日的旗帜,大家从四面八方都奔向延安。”^{[1]369}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安徽青年王仲方在抗战初期也面临抉择。国共合作后,两党都抗日,去哪一边呢?王仲方说:“我们不只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而且考虑到两个都表示要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是大公无私真正抗日的,哪个是以抗日为名,仍然坚持一党私利的。我们要救的国是要恢复腐朽的旧中国,还是要经过抗日建设一个新中国。通过历史的教训和先进理论的指示,我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2]王仲方的讲述表明,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作出去延安的选择是经过对国共两党的客观对比后的郑重选择,决不是匆忙的决定,他们不但深信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而且代表着光明的前景;这些青年不但是致力于抗日救亡,而且

收稿日期:2015-05-25

作者简介:杨军红(1974-),男,河南叶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目标更高远,还志在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坚定的信念和建设一个不同于腐朽的旧中国的崭新中国理想和追求。

实际上,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执政资源,提供的待遇也远优于共产党所能提供的。国民党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全国很有影响,一旦进入学习将预示着良好发展前景。可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还是选择了跟随共产党抗日,甚至不远数千里奔赴延安上抗大、陕公,沿途还要冒着种种不可知的风险。所以,完全可以说,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是下不了决心去延安的。1978年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的邓旭初谈到下决心跟共产党走时指出,是信念支配着自己选择去了延安。他说:“广州起义给未满7岁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影响了我决心跟共产党走而不会跟国民党走……抗战开始,许多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从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最吸引人的一条路,就是投靠黄埔军校……前途自然坦荡,而且待遇不知要好多少倍……所以不是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是不可能选择去延安这条道路的。”^[138]邓旭初的谈话表明,一个地方革命氛围越是浓厚,越能影响一个人的革命意识,对于塑造一个人的革命精神和意志越有促进作用,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日后的道路选择。实际上,广州是第一次国内大革命的重要基地,革命思想和氛围浓厚,广州起义就给年幼的邓旭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做出跟随共产党、抛弃国民党的政治立场选择,这种牢固的革命立场和信念使他宁愿放弃国民党军校的种种优越条件,毅然决然奔赴延安。

二、沦陷区青年经过慎重对比毅然选择延安

从日伪军控制的区域(以下简称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念。他们中间有不少是著名演员、作家、艺术家、画家。他们本可以依靠自己的特长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但是他们毅然放弃一切离开沦陷区,投奔的是延安的共产党而非国统区的国民党,究其原因,正是出于对共产党坚定的信念。

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著名青年表演艺术家陈波儿^[131-2]求学时参加上海艺术剧社,后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通缉出走香港。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率团赴绥远慰问演出,在返回上海途中,受邀观看刚刚从陕北采访回来的斯诺在北京举行的红军图片展,深深为中国共产党人展示出的抗战精神面貌和陕北高原的活力所震动,坚信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从此她下定决心要参加共产党,到延安去。以陈波儿名震上海滩的盛名,想在沦陷后的上海生存发展下去,应该不是难事,但是她毅然离开上海去武汉,并于1938年底从武汉赴延安,走上了跟随共产党、追求抗日救亡真理的道路。

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满怀抗日救国理想离开沦陷区后,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中产生对共产党的高度信任而奔赴延安。江苏东台县青年胡辛人受到小学进步校长的革命思想启蒙,孕育了反抗侵略压迫的革命精神,在一·二八事变中积极参加抗战宣传、募捐支援前线等活动。上海沦陷后他回到苏北加入战地服务团,遇到一名抗大毕业生,这名抗大毕业生通过亲身经历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和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救亡,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学习的情况,引起了他对共产党的极大向往,这时他又读到《西行漫记》,激发了去延安的强烈愿望。山东济南青年知识分子丁里于1935年9月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全面抗战爆发后加入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华北前线从事抗战宣传活动,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慰问演出,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和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所鼓舞,下定决心跟随共产党,1938年3月到达延安筹建戏剧训练班^{[4]231-233}。从沦陷区去延安的不少青年都有类似上述情况,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理想,一路不畏艰险、跋山涉水到延安,充分展示了他们志愿紧跟共产党、拯救民族灾难的坚定理想信念。

也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在日军占领后失学失业,在找寻出路的过程中找到了共产党。山东临沂青年马宗涟是因山东失陷而失学的学生,当时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他在无奈随校流亡的“途中和9个同学密商决定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不过当时决心虽大,但仍顾虑重重:一怕暴露后遭到国民党迫害

和反动势力的阻挠;二怕家境贫寒,筹不到路费;三怕我是独子,父亲不肯”^{[1]348-349}。在抉择的重要关头,马宗涟获父亲支持,不但凑到了5块银元,而且他的父亲还亲自骑车把他送到学校,得以顺利成行。马宗涟的经历表明,沦陷区的很多学生青年基本上处于失学流亡状态,不甘心受日伪统治的青年开始向外寻求出路,这时面临道路选择问题。也表明,对青年人来说,每当处于选择的关键时刻,来自方方面面的正确引导就极为重要,马宗涟能够选择去延安就与父亲给予的支持密不可分,革命成功后马宗涟回乡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共党员,不难推测,他选择去延安与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平日里对他的言传身教有关系。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已深入中国广大城乡,成为广大青年学生政治信仰指向的重要对象和力量,这是他们日后选择共产党的重要基础。

还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是基于共产主义理想而去延安的。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青年有不少来自沿海或南方等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上海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中共中央所在地、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在这样的环境中的青年学生耳濡目染,不可能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青年知识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会起到促进作用,一旦拥有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心中极易产生对中共的向往。作为另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发源地之一的北京也是这样,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相对容易树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培养起革命的精神和意志。而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又成为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不久还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革命圣地,自然会受到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的关注和向往。抗战初期去延安的上海青年知识分子赵戈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建国后曾担任兰州军区政治文化部部长。他谈到自己去延安的情况时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驱使,让他投身延安。据他说,有许多富家子弟也是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抱定吃苦的信念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当时我同20余位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像我这样来自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热血青年并不少,有些甚至还是富家子弟。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线,投奔延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坚强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1]318}。赵戈的叙述表明这些青年是怀着共产主义理想去延安的,延安是共产党领导,有共产主义理想,正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理想对有相同信仰的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许多富家子弟同样怀有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实情,富裕家庭的经济条件可以供起他们的子弟上学,其中有一些人比较敏锐地接受了新思想、新学问,为他们逐渐接受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的家庭条件都不错,使他们得以读书识字明白道理、培养孕育革命精神。

三、中共党员或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

在国统区、沦陷区从事党所安排的工作的中共党员因工作需要由党组织调派到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党员听从党的号召,服从党的安排,而且在抗战时期中共面临严峻考验的环境下,能志愿加入共产党本身就说明他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觉悟以及对中共的坚定信念。抗战时期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的李昌自觉把个人命运和党的工作统一起来,听从党的需要和工作安排三进延安,最后一次留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李昌曾三次去延安:1937年4月,在北方局代表彭真的带领下,与黄敬、杨学诚、林一山赴延安,作为白区代表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1938年4月底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于5月初召开的青年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李昌当选为委员;8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蚁社,开始抓捕李昌,李昌随周恩来离开武汉,第三次去延安^{[5]383-384}。可以看出,前两次去延安是工作需要,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青年领袖,按照规定是要参加全国层次的有关会议。而第三次去延安,自身安全因素是主要原因,但是不能因为自身安全是主要因素就否认党员对中共的信念,对那时的绝大多数党员来说,不管

身处多么恶劣的环境,对党保持高度的忠诚和信念都是一以贯之的。

和李昌类似因为工作需要奉调进延安的还有不少人,作为共产党员,这些青年都以服从组织安排为首要任务。河北完县(今顺平县)青年丁浩川^{[4]192-194},1925年就读保定的直隶第二师范时就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加入北平左联,因游行被捕,1936年出狱后坚定了跟党走革命信仰和立场,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编写《政治常识》课本,指出抗战必胜,帮助群众坚定了胜利信心。他在临汾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总队部宣传部长,由于工作地方相继沦陷,按照党组织安排,先后随民先总队部辗转于临汾、西安、武汉等地,1938年11月到达延安。

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很多也属于党组织行为,一般由这些根据地的党组织负责安排或给予支持。这些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党组织给予他们的工作安排,或调动或派遣;二是延安之外的根据地青年知识分子个人去延安的愿望迫切,由当地党组织给予支持帮助。因为有党组织的安排和帮助,这两种情况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可选择的余地也不大,但同样体现了对中共的信仰。北京青年知识分子齐燕铭^{[6]1-7}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放弃了教师的职业,在鲁西北和冀南参加抗战,并任著名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的秘书。后因冀南水灾,到重庆呼吁救灾,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他按照组织的安排去延安。而当年去延安的山西革命青年黎雷^{[1]224-225},14岁就在县妇救会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被保送牺盟中心区军政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随抗敌决死队做抗日宣传。1938年3月入党,之后她在组织安排下到党员训练班培训学习,直到地方党组织安排她去设在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深造。在那个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自愿参加革命、志愿加入党的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这是党的纪律要求,也是他们的政治觉悟。正是靠吸引并拥有了大量在时局艰难情况下对党保持高度信念、一切听从党指挥并富有勇敢献身精神的革命青年,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断为自己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强大的活力,逐渐发展壮大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参考文献:

-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浦江之畔忆延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 [2]王仲方.永远的延安—我们的青春岁月[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 [3]中央电视台《重访》栏目组.红色丽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 [4]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人物传: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 [5]周士元.李昌传[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 [6]马永顺,朱雨滋,齐翔安.齐燕铭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The Power of Ideals and Beliefs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Going to Yan'an o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Yang Junhong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from Kuomintang controlled areas and enemy occupied areas had strong belief in Communist Party, with Communism ideology and patriotism mind, they went to Yan'an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deal and belief; young intellectuals; Yan'an

(责任编辑 张春生)